

載於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編)(2012)。 *澳水漁風: 人. 俾. 事* (頁 1-10)。
香港: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大澳的貧窮與社會資本： 「需要為本」及「資產為本」的分析

黃洪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成立了三十週年標誌者香港社會工作者在鄉郊區進行社區工作三十年，近年我與辦事處的同工共同探討如何應用「資產為本」的角度來開展大澳的社區工作。我亦曾到大澳進行一些探訪和研究，以下是有關探討的初步總結，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討論。本文將首先簡單介紹什麼是資產為本社區發展的概念，及以需要為本及資產為本的角度來檢視香港的鄉郊區。在第二部份，我將以大澳區作為分析的對象，以「需要為本」及「資產為本」兩個同樣重要的角度來考察大澳的貧窮及社會資本的狀況。希望大家都能從「半杯水」中看出我們所欠缺的，要有所追求及爭取，亦能看出我們所擁有的，要有所珍惜及保育。

什麼是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

資產建設 (Asset building)

根據由 M.謝爾登教授(Michael Sherraden)所創立的社會發展中心(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對資產建設的定義，資產建設是指將資源累積並投資於社會及

經濟發展。有關投資可以是人力、社會或實質資本。很多時是指在教育、擁有房屋及發展小企業的有關建設。

而資產建設的最終成功標準是跨代的幸福，要有跨代的資產累積與發展。而以資產為本的政策及計劃則是指有不同的實踐去推廣低收入家庭去獲得資產而不是獲得傳統的入息援助。這對低收入家庭有正面的影響，而且更能協助這些人士長遠脫離貧窮。

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

當社區面對社會及經濟的挑戰時，很多時社區的成員不其然會想起「需要」、「問題」、和「不足」----,例如缺乏工作崗位、缺乏給青年人的機會、老人/非生產人口過多、低技術、低學歷、缺乏投資。



圖一: 這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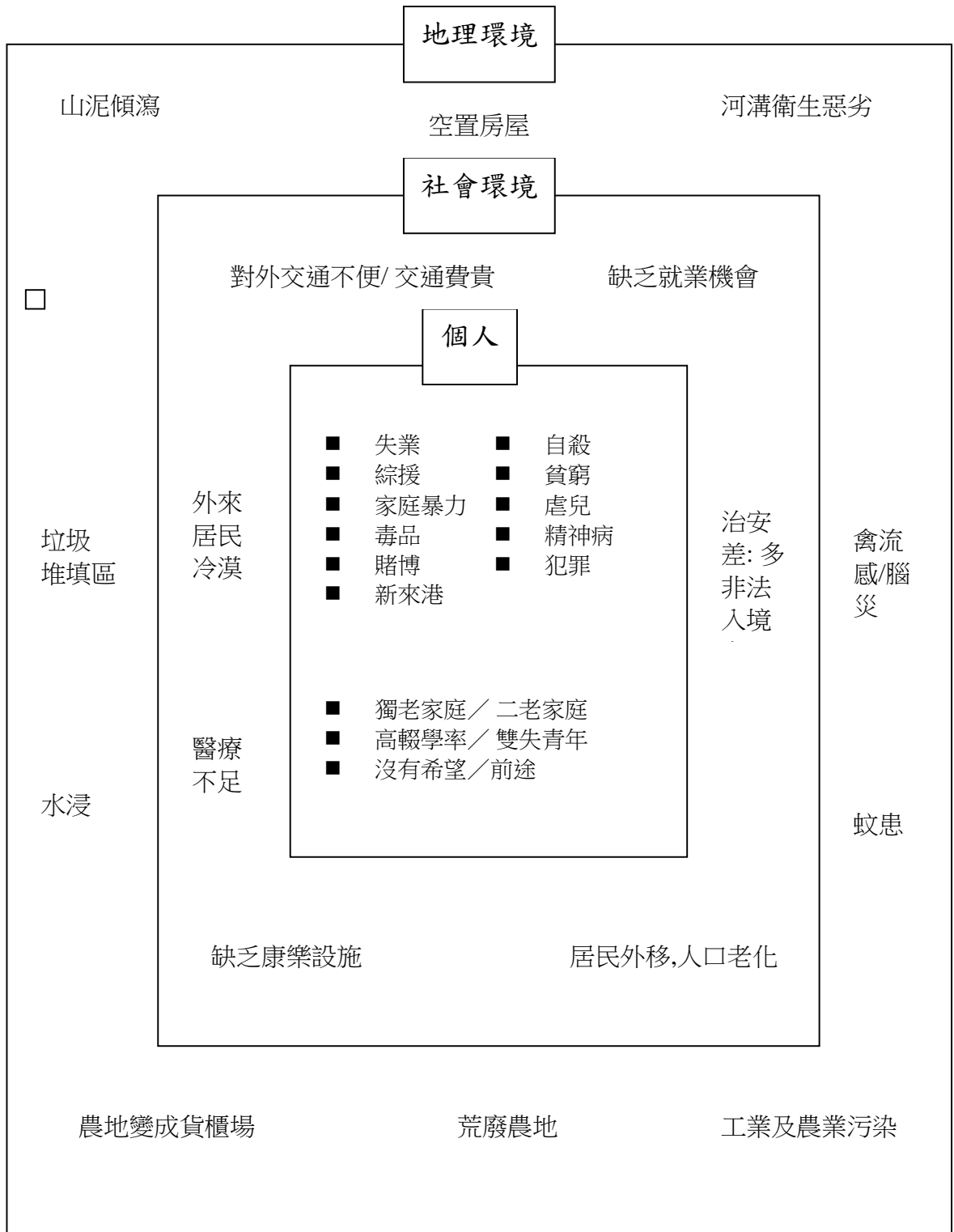
但美國西北大學的 Kretzmannh 與 McKnight 教授則認為上述看法只是將圖一中的半杯水說成是半空的。上述角度分略了在社區早已存在的「資源」、「技術」及「能力」。

他們認為將社區看成是半滿還是半空有很重要的不同。一個鄰舍社區若只被看成是「有需要」及「有問題」的，是一個「空虛」的社區，那麼這社區便會接受到很多由外來專家設計及推行的服務。居民便處於被動、無力、及依賴外在協助及援助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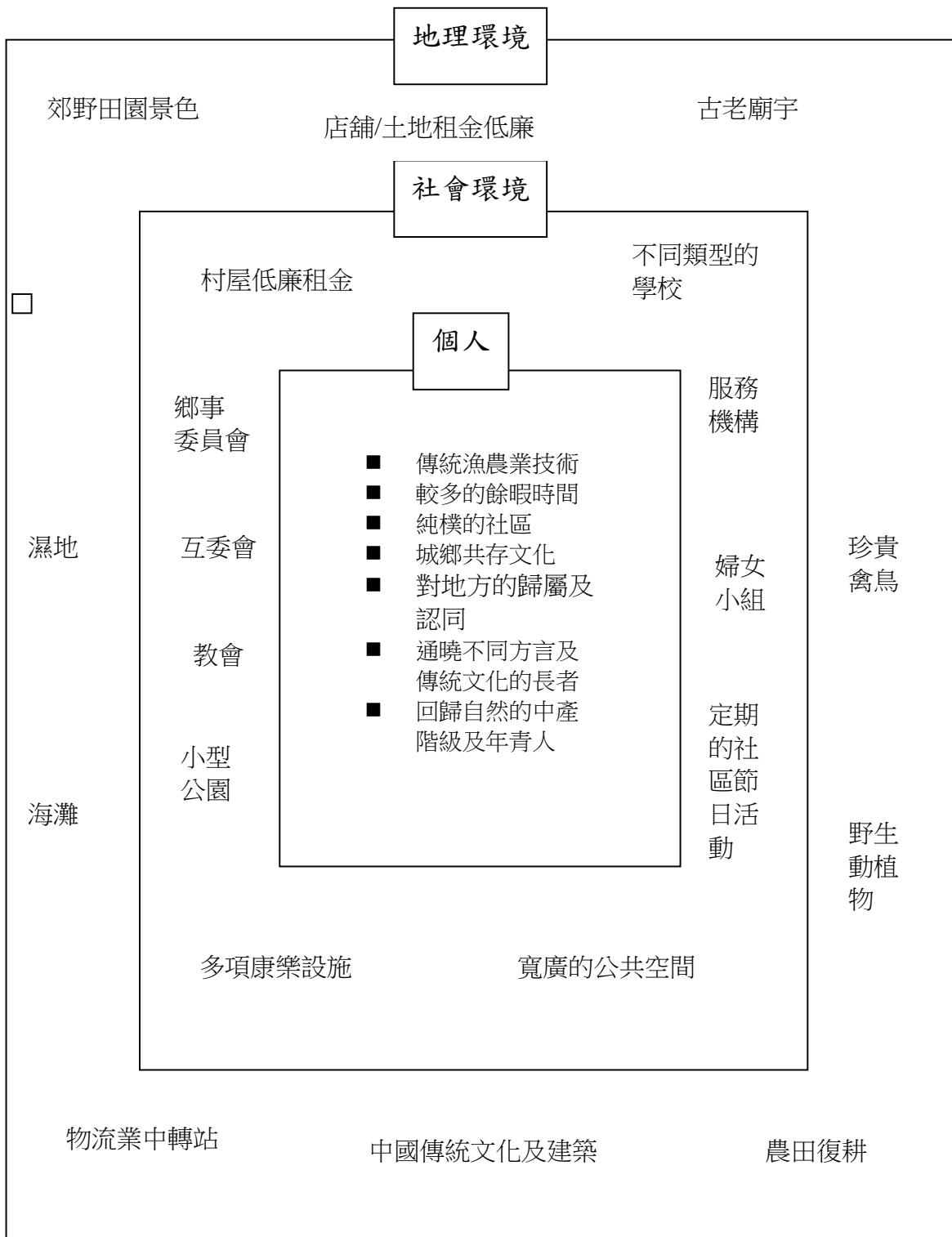
當一個社區便描述是一個資源豐富、得天獨厚的社區，那麼居民所擁有的技術較有可能使用來回應社區的事件和解決問題。外來的協助及資源仍有可能有需要，但議題是由當地的居民所決定。在這類鄰舍中的人是有參與的公民，能夠塑造自己的將來。

Kretzmann 與 McKnight 強調所有社區、所有人均是得天獨厚、資源豐富及有能力的---- 就算是那些在社會及經濟轉變中最被邊緣化及最受害的社群。他們的將「需要地圖」(need map-- 圖一)轉成為「資產地圖」(assets map-圖二)。

圖一: 以需要為本的社區描繪: 以鄉郊區為例



圖二: 以資產為本的社區描繪: 以鄉郊區為例



以資產為本來考察的角度社區，並不是認為社區及區內的人再沒有事件或問題，而是打開了一種新的方向來面對挑戰。這表示將同一人或同一事從另一角度來看待：一個失業的漁農工人成為一個有經驗可以貢獻社區的人，一個孤寡老人成為一個慈愛及有見地的長者，一幢空置的樓宇成為社區中可能有用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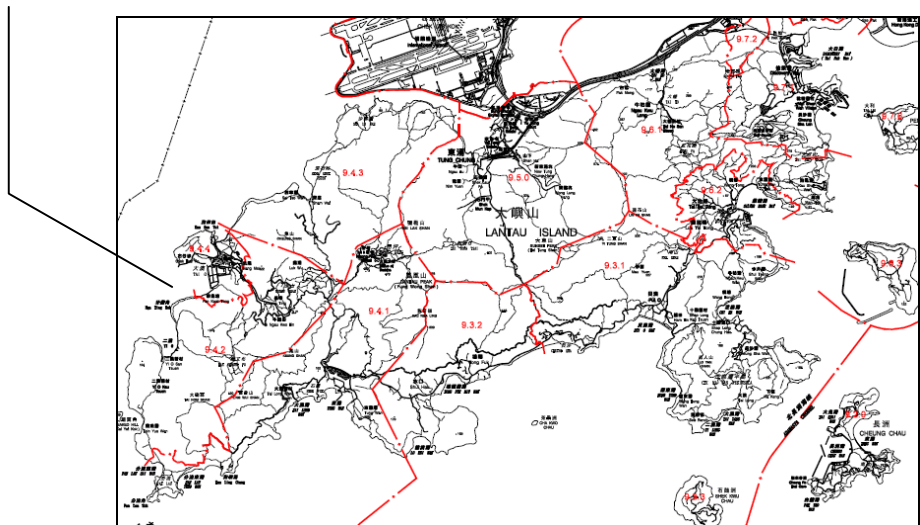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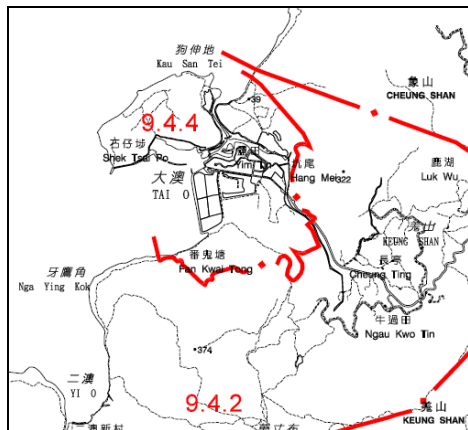
Kretzmann 與 McKnight 指出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有三大原則：

以資產為本(Asset Based): 社區發展的策略是由社區中有什麼開始——居民及工作人口的能力；地區中的組織及團體，而不是社區中缺乏什麼，或是什麼問題，或是什麼需要；

「以內部為焦點」(internally focused): 首先要集中加強居民建立議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關係作推動」(relationship driven): 延續建立及再建立本地居民、本地組織、及本地團體之間及內部的關係。

大澳區的貧窮與社會資本：需要為本及資產為本的角度



圖三:小規劃統計區 9.4.4 (大澳)位置圖

筆者認為「需要為本」及「資產為本」是兩個雙輔雙承的角度來觀察社區及作出介入，以下將根據兩角度就大澳區的貧窮與社會資本的狀況作出分析，筆者將根

據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的資料以及在 2005 年期間到大澳了解居民生活狀況的訪問作出分析。

首先，我將以「需要為本」的角度來考察大澳區的貧窮狀況。在 2006 年，以 9.4.4 小規劃統計區為統計單位，大澳區內有 1,323 住戶共 2,951 人居住。居民中 65 歲及以上的長者高達 32%，相對全港長者比例 12.4% 高出近 20 個百分點，大澳區居民的年齡中位數是 56 歲，而全港的中位數是 39 歲，可見大澳區內人口老化情況非常嚴重。

大澳區內勞動人口只有 1,050 人，勞動參與率只有 39.2%，只及全港勞動參與率 60.3% 的六成半，可見區內較少工作機會，令大量成人並未參與勞動力市場。雖然大澳是香港最古老的漁村之一，隨著魚獲的減少，區內的漁民愈來愈少。在 2006 年，大澳區內工作人口中只有 68 人(7%) 漁農業熟練工人，亦只有 36 人(3.6%) 的工作地點在「水上」，可見以捕魚為生的大澳居民數目大幅減少。反而隨着旅遊業的發展，區內的旅遊及服務員的從業員的人數及比例有所增加。工作人口由 2001 年的 861 人增至 2006 年的 1012 人，在 2006 年，工作人口其中 30% 是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19% 為非技術工人、14% 為文員，12% 為工藝及有關人員則多是裝修及建造勞工。區內工作人口的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是 9,615 元，略低於及全港中位數 10,000 元。有 14.4% 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少於 4000 元，相對全港 11.6% 為高，其中更有 5.3% 工作人口的每月收入少於 1000 元。

在 2006 年，大澳區 1,323 個住戶中，有 43% 為單人住戶，有 31% 為兩人住戶，可見區內較多是獨老及二老家庭。住戶的收入嚴重偏低，有 43% 的住戶每月收入少於 2,000 元，另有 31% 的住戶月入界乎於 2000 至 3999 元。亦即有 74% 住戶月入少於 4,000 元，大幅高於全港的 9.2%。大澳區住戶月入中位數為 5,072 元，只及全港住戶月入中位數 17,250 元的 29%。所以若從低收入住戶的比例，以及其收入水平之低來看，大澳區均屬香港各區中最貧窮的統計小區之一，而且其居民人數亦較其他的鄉郊區為多。

第二，我將分析大澳區居民收入偏低與區內社區經濟發展歷史有關，大澳是香港最古老的漁村之一，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這裡的原居民「蜆族人」是香港唯一的原居少數民族，主要以捕魚為生，而後來大澳的曬鹽業亦成為居民重要的經濟來源。一直至七十年代，大澳的居民亦多為漁民，以捕魚供本身食用及交換米糧。但大澳的漁業在八十年代開始式微，而漁民的生活亦出現明顯的變化。以下是三個不同的漁民個案，表明有關漁業發展的盛衰與居民生活變遷的關係。

樹伯，男，78歲，獨居(大澳-1)(假名-下同)

樹伯於40年代開始打魚，開始時魚獲多在大澳區內交及「收魚」的居民再發售，1945年後他多將魚獲送至西環漁業統營處，而46、47年是魚獲最豐盛的時期。及至60年代，由於珠江河淤塞以至魚產漸少，影響了他的收入。因此他在60年代離開大澳，轉到青山碼頭工作，當酒樓伙計，那時每月工資約200元。1971年樹伯轉到鯉魚門海鮮酒樓負責養魚，當時股市大好亦連帶他收入上升，最高紀錄每月可得800元。但到73年股災，令海鮮生意變差，最後他在70年代末轉做製衣廠工人，每日工資約\$4.8。直至80年代末，他返回大澳從事「收魚」，當時的魚獲已相當少，僅有黃花、漕白、馬友，直至90年代中，即約60多歲就開始退休了。

近十年生活的轉變：

近10年樹伯由工作晚期(收魚)到退休，他的太太和子女都搬出香港居住，只有他自己獨居於大澳棚上，靠領取綜援過活。

陳先生，男，50歲與一名妻子、3名女兒同住(大澳-2)

陳先生出生於大澳漁民家庭，家中有數兄弟，漁民家庭多孩子，小時候家中與叔伯們一起居住，由阿爺「話事」。陳先生8歲開始搖船，他憶及60年代魚獲開始減少，他亦由那時開始從事漁業。當時大澳的漁業，主要以內銷為主，因為那時大澳人口較多有足夠的需求，一日的成本約為300至400元，油價亦低。至80年代中仍有魚獲，但到了88年開始，因為興建機場以及漁民都到大船往海南工作，他在1985年離開了家中的漁船，改為到其他的大漁船打工，到海南島海域捕魚，但三年後就放棄回到岸上從事搬運工作。陳先生說現在大澳只剩下7至8條「蝦艇」，漁業因此出現「老人打唔到，後生唔識打」的情況。陳先生認為大澳漁業日益貧富兩極化，因為一些較有錢的漁民可有貸款、有資本出遠洋捕魚，但一些無錢投資的漁民則又無資本又無漁獲，最後更可能失去工作。

1988年陳先生回港，其後兩年陳先生皆與妻子住在船上，直到長女需要讀書就開始到岸上公屋居住。上岸後陳先生轉到漁農處任職清潔，但在97年陳先生因為工作太辛苦的緣故而離職。他認為「由於大澳現時只有政府工做，而打魚又只請內地人」，故在政府服務的減少後，他再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只能在岸上「打散工」。近年陳先生並沒有穩定收入，當遇到泥工等散工時就會立即上工，如果無就泥工去一些大行曬咸魚幫補收入。另外，因為大澳有部份地方會建樓、發展，他亦會去沙灘工作，負責挖沙、運沙；他亦試過「做艇」，負責搬石仔等等散工的工作，但一日工資只有50元。除了散工外，就是靠低收入綜援維持一家五口的生計。

李先生, 男, 40多歲 (大澳-3)

李先生生於一個十人漁民家庭，在60年代前與家人一起住在船上，及後因為船太舊而搬上岸，住在山上的木屋區。他在讀完小學後開始學做泥工。直至1975年，他決定離開大澳，走到深水埗學師，每月收入約\$500。但到90年代，由於工廠北上，李先生失去工作後就回到大澳。那時他仍喜愛大澳的生活，生活不會太緊張，當時的生活主要是間中做散工如搬運電器到大陸賣。直到95年，他就開始從事電纜搬運的工作直至2003年。之後至2005年，他仍沒有穩定的工作，他現在間中會到東涌做替工，日薪約\$192。

這三名出生於不同年代漁民家庭的男士，均曾經在家族的漁船上工作，但由於漁獲愈來愈少，三人均曾經在人生不同時段離開大澳到外面謀生。但由於學歷不高，所以都是從事工廠、酒樓及清潔等非技術工作。當在外面經濟環境變差時，他們唯有被迫返回大澳生活。但到九十年代，隨着大量的濫捕、環境的污染，漁獲大量減少。加上油價的提升，大澳本身人口減少令對漁獲的需求下降，令他們沒法再依靠捕魚為生，而改為從事體力勞動的零散工作。除了依靠散工不定期及微少收入，其中兩人亦要領取綜援。他們的工作歷史顯示隨着漁業以及相關的修船業的沒落，加上年青人口大量外移，大澳區只剩下缺乏多元的本土經濟以及足夠的體力勞動職位讓這些前漁民謀生。而這社區經濟的變遷是大澳貧窮問題產生的結構原因。

李先生(大澳-3)

近十年生活的轉變：

漁業在近 10 年已進一步衰落，蝦艇已不能賺錢，這與多個外在因素有關，如油費上升、銀行沒有信心給予貸款等，都令成本上升，限制了漁業發展。同時，從前賣剩的魚可以到蛇口附近的地方換米，但現在則無人要那些魚。現在僅存的漁民多是外地人而不是大澳人，而那種較先進、需要更多機器的漁業更只令某一部份人得益，這些不利因素都令大澳漁業不能持續下去。而一些大型、以公司模式營運的漁船都傾向請內地人，它們以賺錢為目的，與傳統漁業維生的目標不同。他們會用很先進的方法捕魚，但就很易毀滅了魚種。現在李先生沒有以打魚為生，只是偶爾在假期時參與打魚作為生活的補貼。李先生坦言近 10 年大澳的交通較從前方便，這亦鼓勵了大澳人離開大澳。

陳先生(大澳-2)

近十年生活的轉變：

從「住棚」到「上樓」，陳先生認為最大的好處就是「落雨打風」時總算不需擔心，但他其實較喜歡住棚時鄰舍的親切感，以及住棚有冬暖夏涼的好處。現在的公屋住戶有很多都是非大澳原居民，只是外來人希望搬進來後等再調遷到較好的公屋，所以居民較混雜。他認為在大澳的生活應較為無壓力，閒時可以打牌、捉魚，而這裡的空氣亦較市區好，居民亦因為習慣勞動而較為健康。

陳先生形容大澳的人際關係既緊密亦鬆散，因為許多居民都有親戚關係，在一些傳統節日中，仍有不少家庭團聚的時間，如端午節練龍舟。不過，今天的大澳並非想像中般融合，特別是住棚的與上樓的居民就像分割了，即使是家庭成員都會有不同的感覺。在社區參與方面，大澳人參與社會事務的動機不高，很多事都以鄉事會為主，但遇到有一些社區問題需要大家一起解決時，居民才較有動機參與。

另一方面，陳先生認為近年經濟不景，但很多人以為大澳旅遊業好像發展得不錯，但其實這對本地人並沒有實質益處，例如那裡的工程大多聘請外地人。再者，大澳並沒有足夠的景點吸引遊客，他們最多只會來一次，而交通亦不太方便。而大澳的一些規劃，如興建避風塘，更破壞了漁港。另外，近年大澳的治安較從前差，如有非法入境者，而船隻停泊區更吸引了賊船。在環境方面，陳先生認為近 10 年整條涌都較之前骯髒，而社區設施如小學，以前有四間而現在則更少了。

最後，我將以「資產為本」的角度，考察大澳區的社會資本狀況，說明為什麼大澳區的居民雖然收入偏低，但生活不一定困苦，反而可能比市區的貧窮人士有更好的生活質素及更快樂的心境。

雖然，大澳的工作機會不多，但大澳區內居民由於很多都有親戚關係，彼此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所以吸引他們在外面經濟不景時希望能夠重回大澳。有強力連結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社區能吸予居民歸屬感及安全感，令他們可以在外面風雨飄搖時，可以重回大澳這個避風港，過著簡單但安穩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大澳傳統的鄉郊社區，居民的生活較少壓力，亦可以有共同的興趣如閒時可以打牌及捉魚及節日時的集體活動如端午節的「練水」，令居民可以在低收入的情況下仍有一定的社交生活，保留重要的社會支援網絡，而避免出現在市區獨居長者孤獨及無支援網絡的情況，收入雖然很低但仍有一定的生活質素。

但是漁業的發展出現兩極化，少部份漁民家庭進行大量借貸及投資購買先進設備的大型船隻進行離岸捕魚，捕魚業由傳統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以企業化的方法來經營，而這種商品化企業化的捕魚模式，進一步令近岸魚類資源大幅減少，令以自然經濟為主的捕魚業無法再生存。而大部份漁民家庭的下一代在面對魚獲減少、油價上升以及市場減少的情況下則要放棄捕魚要上岸謀生。企業化的經營模式令大型船主傾向聘請大陸漁工，而不再單靠親友參加入作業。而小型船隻較貧窮的船主則無法維持眾多家人的生計，亦無法支付高昂的燃油及維修費用，唯有放棄傳統以捕魚作為謀生的來源。無論是企業化的大船戶以至是傳統家庭作業的小艇戶，家庭作為經濟組織的紐帶功能日漸消失，只剩下血緣關係成為家庭成員間的紐帶。家庭作為社會資本累積基本單位的角色亦日漸減少。

漁民的文化及風俗仍然令漁民間的關係密切及融洽，但亦令他們難以完全融入岸上的居民的生活。水上人、原居民與新遷入居民的關係並不密切。正如陳先生所說的不同社群之間仍出現「分割」的情況。這顯示大澳區在漁業衰退的情況下，漁民同質性的連結社會資本在家庭經濟功能的消失下經已受到一定的衝擊，而

在整體社區不景氣的情況下，漁民與其他居民亦難以發展異質性的橋樑社會資本。所以社區在貧窮狀況的影響下，傳統鄉郊區的社會資本亦受到削弱，並不如前鞏固。

然而，貧窮的狀況並不單單與居民的收入情況有關，亦與居民的支出模式有關。鄉郊區中居民多擁有自己的房屋，就算是租戶的租金亦相當便宜，而大澳區的居民更多在棚房居住，其房屋支出較市區的居民廉宜。在 1,323 個住戶中，其中六成居於自置居所之中，而沒有按揭及貸款的更高達 53%，所以這部份居民無須負擔高昂的房屋開支。另外四成住戶為租戶，其中有兩成半住戶的租金每月少於 1,000 元，一成住戶的租金住於每月 1000-1499 元之間。可見居民的房屋開支較市區低廉，令居民可以在低收入的情況下維持基本的生活。除了住屋的費用低廉外，大澳區居民亦可以購買由大陸漁船運來的日用品及食物以減低生活的開支，來應付低收入的生活壓力。過去亦利用搬運電器入大陸作為經濟來源的辦法。所以在傳統鄉郊區中居民可利用非正規經濟不同的辦法來維持生計。所以就算收入很低，居民生活質素仍不至太差，反而單單首重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人際關係的

李先生 (大澳-3)

如何面對貧窮及理解貧窮：

李先生收入不多，而大澳的生果、菜、魚對他來說都較貴，因此他日常需要多靠平日來大澳的漁船所出售的貨品，但在休魚期就買不到。由於收入不高，李先生的最大娛樂不是一些消費性的活動，而是與朋友釣魚、飲啤酒。

李先生記憶所及，以前的大澳較現在繁榮，有咖啡室、水果檔、賣小食物的粥檔，但近 10 年，雖然遊客多了，但居民就愈來愈少，而空氣亦較差，特別是大陸的工業污染令吹來的北風都很污濁。而人際關係方面，李先生指出大澳的「保守派」傾向留在社區裡，而「年輕派」則傾向搬出東涌，不過亦有少量外地人搬進來。但李先生始終覺得大澳的人脈關係不錯，因為「打開門都係識得」，上樓後與親友亦可保持良好關係。

就大嶼山發展的問題，李先生認為大嶼山與大澳的關係並不密切，即使大嶼山發展，但其建設的對象並不是本地人，而興建迪士尼後可能令大澳更少遊客，因為他們多走到那邊而不會再來大澳。

陳先生 (大澳-2)

如何面對貧窮及理解貧窮：

陳先生育有 3 名小孩，現在除了散工外，就是靠低收入綜援維持生計。因為一家人的交通費實在太貴，他們一家每月只會出一次大澳以外的地方，而他亦說過：「有得揀，都想 d 仔女上岸」。不過，在大澳區內的消費亦不便宜，如菜、肉、日常用品，大澳賣的貨都算昂貴。不過，陳先生說不時有一些從大陸來的船，他們會售賣一些國內的日用品甚至食物，它們一般都較大澳市面賣的便宜，有助他們解決生活的困難。

樹伯(大澳-1)對大澳的觀感及意見：

近 10 年大澳的「偏門生意」較少，從前很多人會搬電器到內地轉賣，但現在已無人要。不過，近年酒樓、海味店的生意是不錯的，但漁業就衰退至剩下 7 艘蝦艇，而大漁業及工程都傾向請內地人工作。至於本地人，多打政府工，如清潔河涌，或請女性掃街。

大澳區居民面對貧窮處境的生存策略並不獨特，在其他鄉郊區居民可以透過「非正規經濟」或保留傳統自然經濟的方法，如自己種菜或飼養生蓄等方法來減低生活開支，所以居民仍可以面對低收入的生活。反觀市區中的貧窮小區人口稠密，其租金昂貴，居民亦較難透過「非正規經濟」的辦法來減低生活開支，所以貧窮問題更加嚴重。

參考資料:

Kretzmann, John & Mcknight, John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The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

Sherraden, M.S. and Nimacs, W.A. (1998)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pp.20-40.